

杨玉环少时考

岳东

(华清池管理处文史室, 陕西 临潼 710600)

摘要: 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世代信佛, 开元十二年蜀州青城山佛道争观, 唐玄宗亲自干预, 支持道观, 玄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玉环成为孤儿后, 被接到洛阳, 随叔父杨玄璈生活。玄璈蓄有粟特裔妻妾, 她们经常携带玉环到袄祠进行聚会, 参加粟特祭天仪式, 玉环在那里学会了酣歌醉舞。这种祭祀活动包含着昭武九姓胡的生活习俗, 边嗜饮葡萄酒, 边载歌载舞。杨玉环因生活环境的缘故, 得以受粟特文化的熏陶, 而精通了外来的乐舞艺术。

关键词: 佛教; 粟特; 袄祠

中图分类号: K242.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4970(2011)06-0063-04

收稿日期: 2011-02-26

作者简介: 岳东(1969-), 男, 陕西咸阳人, 华清池管理处文史室文博馆员, 历史学硕士。

杨玉环生于蜀州(今四川崇州), 父亲杨玄琰死后, 玉环往洛阳(今河南洛阳)随叔父杨玄璈生活。她少时的生活, 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五代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、后晋刘昫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、北宋欧阳修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、北宋乐史《杨太真外传》等都有零星记载, 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本史料。学界关于杨玉环少时的研究, 集中于其籍贯纠纷一事上, 独黄永年先生《唐史十二讲·杨贵妃和她的故事》力辟冗杂, 批驳了《杨太真外传》关于落妃池的离奇编造, 揭露了《全唐文·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》的伪造性质, 从而解决了杨玉环的籍贯、出生地问题^①, 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少时杨玉环的基础。玉环少孤, 其父玄琰的死因, 至今未有谈及者, 然而这一点对玉环一生影响很大, 正是我们要填补的空白。关于杨玉环在洛阳出嫁前的生活, 在小尾郊一的《杨贵妃》、许道勋等的《唐玄宗传》等传记中均有提及^②, 并注意到她学习乐舞之事。众人熟知的贵妃醉酒, 即醉后载歌载舞, 与这段时期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呢? 史界尚未注意, 这一点与杨氏家族门风有关, 也值得推敲一番。下面, 就玄琰的死因、玉环学习酣歌醉舞两事, 试作推断, 或许有助于杨玉环少时的研究。

一、玄琰之死

(一) 开元前期的益州长史

益州(今四川成都)为西南大郡, “成都府, 隋蜀郡。武德元年, 改为益州……垂拱三年, 分雒、九陇等十三县置彭、蜀二州……天宝元年, 改益州为蜀郡, 依旧大都督府, 督剑南三十八郡”^{[1]卷41, 1663-1664}。蜀郡即益州,

唐前期的益州大都督府、后期的剑南节度使治所。下辖有蜀州, 开元初, 玉环“父玄琰, 蜀州司户”^{[1]卷51, 2178}。蜀州置于唐初, 人烟稠密, “蜀州, 垂拱二年, 分益州四县置。领县四, 户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七, 口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四”^{[1]卷41, 1667}。杨玄琰职务为“户曹、司户掌户籍、计帐、道路、逆旅、婚田之事”^{[1]卷44, 1919}。其地处都江堰平原地区, 经济发达, 玄琰作为其地官员, 生活水平应该不错。玉环出生于哪一年呢? 据《旧唐书》载: “(杨贵妃)从幸至马嵬……遂缢死于佛室。时年三十八。”^{[1]卷51, 2180}马嵬之变为天宝十五载(756), 往上推溯, 则杨玉环当生于开元七年(719)。

杨玉环早孤, 关于其父母的死因, 史料未载, 今略为分析。玄琰之死似有三因: 一为生理原因, 亡于年迈体衰, 或死于疾病; 二为吐蕃入侵; 三为益州内政。

其一, 玄琰或许比玄璈年龄大很多岁, 玉环则系玄琰老来得女, 玄琰因年老而亡, 似不太通情理。或因疾病而亡, 但玄琰夫妇均亡于同一病症吗? 若非流行病, 恐也不能有此离奇之事, 然玉环以幼儿尚存, 而玄琰夫妇却死亡, 于理恐也难通。所以, 生理原因可排除在外。

其二, 在唐代抗击吐蕃的前线中, 益州的重要性仅次于陇右(治鄯州, 今青海乐都)、安西(时治龟兹, 今新疆库车)。但玉环生活于蜀州时, 未有吐蕃大规模骚扰之事, 仅有一次预谋袭击, 也被益州长史苏颋

① 黄永年《杨贵妃和她的故事·讲历史》, 《唐史十二讲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7年, 第69~76页。

② [日]小尾郊一著, 韩昇译《杨贵妃》,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1989年; 许道勋、赵克尧《唐玄宗传》,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93年。

成功摧毁于未萌，（开元八年）嵩州蛮酋苴院私与吐蕃连谋，将为内寇。颉颃其谋，将士咸请出兵讨之，颉不从，乃作书并间谍以送苴院，苴院惭悔，竟不敢入寇”^{〔1〕卷68, 2881}。显然，玄琰的政治生涯、身家性命没有受到吐蕃的影响。

其三，当时的益州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开元七年（719）前后益州的最高军政主持者，或许可找到一丝线索。

玉环出生前。韦抗“开元三年，自左庶子出为益州长史。四年，入为黄门侍郎”^{〔1〕卷92, 2963}。这位益州长史任上未有什么大事。

玉环一岁时的益州。“李麟，皇室之疏属，太宗之从孙也。父浚，开元初置十道按察使，精选吏才，以浚为润州刺史、江南东道按察使。转虢洛二州刺史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摄御史大夫、剑南节度按察使。所历以诚信待物，称为良吏。八年卒。”^{〔1〕卷112, 3338}最迟至开元八年（720），李浚已为益州长史，此时杨玉环一岁。浚号称良吏，为政廉明，玄琰仕途无碍。

玉环一到五岁时。李浚之后，苏颋接任长史，“八年，除礼部尚书，罢政事，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。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，颋一切罢之。……十三年，从驾东封”^{〔1〕卷68, 2881}。苏颋可能卸益州之任于东封泰山之前。苏颋原为开元名相，为人谦逊，与侍中宋璟配合默契，“璟刚正，多所裁断，颋皆顺从其美；若上前承旨、敷奏及应对，则颋为之助，相得甚悦”^{〔1〕卷68, 2881}。他在益州所治也务在安宁，杨玄琰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仕途自应顺畅。

玉环六岁时。开元十二年（724），张嘉贞“复拜户部尚书，兼益州长史，判都督事。……明年，坐与王守一交往，左转台州刺史”^{〔1〕卷99, 3092}。张嘉贞在益州任职一年，待地方官吏颇有礼节，如李勉“父择言，为汉褒相岐州刺史、安德郡公，所历皆以严干闻。在汉州，张嘉贞为益州长史、判都督事，性简贵，待管内刺史礼隔，而引择言同榻，坐谈政理，时人荣之”^{〔1〕卷131, 3633}。在张嘉贞礼贤下士的政治氛围中，玄琰的仕途一仍顺畅。

玉环七岁时。张嘉贞离任后，张敬忠接任益州长史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据史料记载，开元初，张敬忠以御史身份随张仁愿守朔方（治灵州，今宁夏灵武西南），（仁愿）在朔方，奏用御史张敬忠、何鸾、长安尉寇泚……”^{〔2〕卷111, 4153}。开元七年（719），张敬忠任平卢军节度使，在职不足一年，“平卢军节度使。开元七年闰七月，张敬忠除平卢军节度使，自此始有节度之号”^{〔3〕卷78, 1430}。开元八年（720）至十年（722）间，张氏史料缺载。开元十一年（723），敬忠任河西节度使、经略使，“河西节度使。……十一年四月，除张敬忠，

又加经略使。十二年十月，除王君冕”^{〔3〕卷78, 1428}。敬忠在河西（治凉州，今甘肃武威）曾纳降吐谷浑部落，“先是，吐谷浑畏吐蕃之强，附之者数年；九月，壬申，帅众诣沙州降，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”^{〔4〕卷212, 6757}。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末，敬忠继张嘉贞为益州长史，据《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敕书》碑^①记载“敕益州长史张敬忠：……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，闰十二月十一日下。……开元十三年正月十七日，左散骑常侍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剑南道节度大使、摄御史中丞、本道采访经略大使、上柱国张敬忠上表。”^{〔5〕}直到开元十九年（731），敬忠还在任上，史载“成都有唐《平南蛮碑》，开元十九年，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。”^{〔6〕卷1}从以上资料可知，张敬忠从东北迁任西北、西南，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末到开元十九年（731）任益州长史，而杨玄琰可能就死于此时。

关于开元七年（719）前后蜀州刺史，史料记载甚少，正史仅有李祹有传“开元后，累转蜀、濮等州刺史。政号清严，人吏畏而服之。”^{〔1〕卷78, 2651}约为杨玉环出生前的蜀州刺史，其为人有度，玄琰在其下也应无碍。

（二）敬忠辱玄琰

开元十二年（724）末，杨玉环已六岁，蜀州地界的青城山出了一桩事，引起唐玄宗的亲自干预，《全唐文·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》载“益州长史张敬忠，……蜀州青城，先有常道观。其观所置，元在青城山中，闻有飞赴寺僧，夺以为寺。州即在卿节度，检校勿令相侵。观还道家，寺依山外旧所，使道佛两所，各有区分。令使内品官毛怀景、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，故此遣书，指不多及。”^{〔7〕卷35}今四川青城山存《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敕书》碑详载了张敬忠处理此事的时间、经过，内容远越《全唐文》，碑文全录了敕文，并在末尾缀“敕十一日”，为发敕的时间，下另起一段“开元十二年岁次甲子，闰十二月十一日下；十三年正月一日至益州，二日至蜀州。专检校移寺官、节度使判官、彭州司仓参军杨寿，蜀州刺史平嗣先，清城县令沈从简。”^{〔5〕}记载了益州长史张敬忠处理此事的时间，为开元十三年（725）正月一日至十七日，历时17天。

唐玄宗上台后，大力推崇道教，风气如此，益州官员们岂敢不从？青城山道观由蜀州功曹管理，“功曹、司功掌官吏考课、祭祀、祲祥、道佛、学校、表疏、医药、陈设之事”^{〔1〕卷44, 1919}。本与司户杨玄琰无关，但玄琰的信仰与当时政治环境格格不入，将他最终牵涉了进去。陈寅恪先生考证“杨贵妃原出隋代河中王雄之

① 原碑现存四川青城山，碑文见龙显昭、黄海德主编《巴蜀道教碑文集成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。本文所引碑文转录自陈艳玲《略论唐代巴蜀的佛道相争》，《历史教学问题》（上海），2008年第2期。

族”^{[8]附校补记,377}。与武则天母亲荣国夫人杨氏祖裔为一系,沿袭杨隋皇室信佛风气,“可知武曩之母杨氏为隋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达之女。……则荣国夫人之笃信佛教,亦必由杨隋宗室家世遗传所致。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,武曩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薰习,自不待言。”^{[9]162-163} 杨玉环游华清宫(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)石瓮寺时暴露了她极嗜佛事,“至开元初,玄宗治骊山,起造华清宫……以余财因修此寺。群像既立,遂设东幢。帝与妃子,自汤殿宴罢,微行佛庙,礼伽蓝。妃子谓帝曰‘当于飞之秋,不当令东幢杳然无偶。’帝即命立西幢”^{[10]《纂异记·杨祜》,251}。这里的幢指画有佛号、经咒的石柱,李杨二人同游寺观,独杨氏能辨认幢之单双,可见其平日非常熟悉佛家之物。杨玉环能在推崇道教李唐宫廷中,独自信佛,必然是出嫁前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所致。由此,可推测玄琰、玄璿一辈是信佛之家。

玄琰既然奉佛,在处理青城山事件前后,自然偏袒寺僧,与益州长史立场对立,而为敬忠所嫉,受辱而死,自有其可能。敬忠上表之日,即为青城山事件完毕之时,也即玄琰死亡之年,此时玉环七岁,“妃早孤,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璿”^{[1]卷51,2178}。排列开元前期历任益州长史之治,联系杨家家族的世代信仰,将玄琰放置到对应的政治环境中,对照玉环“早孤”之事,玄琰因其身份、信仰而死于开元十三年(725)的青城山事件之际的可能性最大。这或许可充玄琰死因的一种推测。

二、在玄璿宅的生活

(一) 杨元琰宅非杨玄琰宅

如果玄琰确死于开元十三年(725)初,则杨玉环也在这一年开始随叔父玄璿生活。开元二十三年(735),玉环十七岁,被册为寿王妃,玉环随玄璿共生活了十一年。作为闺中少女,玄璿一家的社交圈子无疑即是她的生活圈子。玄璿宅位于洛阳城中何处呢?《增订唐两京城坊考》中没有记载,却载有杨玄琰宅“次北集贤坊。刑部尚书、魏国公杨玄琰宅。泉献诚宅。”^{[11]卷5,集贤坊,347}“次北尊贤坊。杨玄琰宅。泉献诚宅。”下小注“按二宅已见前坊,或跨有两坊之地也。”^{[11]卷5,尊贤坊,349}玄琰生前远在蜀州,怎么会住在洛阳呢?况玄琰生前也未任过刑部尚书,谥号也非魏国公,“天宝初,进册贵妃。妃父玄琰,累赠太尉、齐国公”^{[1]卷51,2178-2179}。居于洛阳的刑部尚书、魏国公当另有其人:

杨元琰,虢州阌乡人,隋礼部尚书希曾孙也。……初为平棘令,号为善政。载初中,累迁安南副都护,又历蕲、蒲、晋、魏、宣、许六州刺史,凉、梁二都督,荆府长史。……及柬之知政事,奏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。……定计诛张易之兄弟,及事成,加云麾

将军,封弘农郡公……寻加金紫光禄大夫,转卫尉卿。……又转光禄卿。……睿宗即位,三迁刑部尚书,改封魏国公。开元初,拜太子宾客致仕。六年,卒于家,年七十九。^{[1]卷185下,4810-4811}

杨元琰在杨玉环出生的前一年已去世,他所历官职、地界与杨玄琰绝不雷同,自武则天朝起,就住在洛阳,唐睿宗时,迁刑部尚书,封魏国公,并卒于集贤坊、尊贤坊私宅中。所以,《唐两京城坊考》中的杨玄琰宅其实是杨元琰宅。史界已注意到此点,如辛德勇在其《隋唐两京丛考》中就以杨元琰宅称之“今本元《河南志》时有舛错,如集贤、尊贤二坊下首行重出唐杨元琰宅和泉献诚宅。”^{[12]141}那么,玄璿宅究竟在洛阳何坊,已不可考了。

(二) 杨雄宅与粟特聚落

杨玄璿宅虽不可考,其祖宅却有记载,敦厚坊“隋有观王杨雄宅”^{[11]卷5,敦厚坊条小注,411}。查《唐两京城坊考图·东都外郭城图》,敦厚坊位于北市正北。北市隋称通远市,是洛阳城中最繁华的地方,不乏逐利的粟特兴生胡,“在龙门石窟的铭刻中却留下了北市的商人等在那里凿龛题记的遗迹:如‘北市彩帛行净土堂’、‘北市香行’、‘北市丝行琢龛’、‘北市香行社,社官安僧道,录事□□□、史立策、□□□、康惠澄……社人等一心供奉。永昌元年(689)三月八日起手’等等。……从所记载的人员姓名中有姓‘安’、‘康’、‘史’等,很可能来自昭武九姓的安国、康国、史国的粟特人”^{[13]54}。

来华粟特人多依袄祠而居,史载“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。”^{[14]卷3,64}“次北会节坊。袄祠。”^{[11]卷5,会节坊,366}“次北修善坊。波斯胡寺。”^{[11]卷5,修善坊,322}荣新江认为“大凡有粟特人聚落的地方,在聚落中都有袄祠和袄舍,即胡人奉祀琐罗亚斯德教神祇的地方。……洛阳南市也是粟特人活动的中心,故此其旁会节坊、修善坊也有袄祠。”^{[15]233-234}实际上,分布于洛阳城中的袄祠应远远超过史册所载的数量。而隋代观王杨雄曾居河东蒲州(今山西永济),“观王家庭妾媵中殊有就地娶中亚酒家胡之可能”^{[8]附校补记,377}。杨雄迁居洛阳敦厚坊,与北市相邻,便于其粟特裔之妾出入袄祠。杨玄璿或也袭其门风,娶有粟特裔妻妾,依袄祠而居。

(三) 玉环学艺

杨玉环精通琵琶,能歌善舞,入宫后,以才艺而著称当时“太真姿质丰艳,善歌舞,通音律,智算过人。”^{[1]2178}她招有琵琶弟子,亲自教习:

有中官白秀贞,自蜀使回,得琵琶以献。其槽以逻娑檀为之,温润如玉,光辉可鉴,有金缕红文叠成双凤。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,音韵凄清,飘如云

外。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,竟为贵妃琵琶弟子,每授曲毕,广有进献。^{[16]51}

她还曾在酒后引领梨园弟子们唱歌:

开元中,禁中初重木芍药,即今牡丹也。得四本红、紫、浅红、通白者,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。会花方繁开,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。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,得乐十六色。……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,酌西凉州葡萄酒,笑领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,每曲遍将换,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太真妃罢,饰绣巾重拜上意。^{[10] 1213}

玉环还曾醉舞《霓裳》,称雄于梨园:

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,时木兰花发,皇情不悦。妃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一曲,龙颜大悦,方知回雪流风,可以回天转地。^{[17]199}

她的酣歌与醉舞,并非仅归为玄宗夫妇的骄奢淫逸,也与玉环少时的经历有关。洛阳祆祠祭祀时必酣歌醉舞、弹奏琵琶“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。每岁商胡祈福,烹猪羊,琵琶鼓笛,酣歌醉舞。”^{[14] 卷3, 64}一如范阳(今北京)祆祠有乐舞相伴祭天,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,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。每商至,则祿山胡服坐重床,烧香列珍宝,令百胡侍左右,群胡罗拜于下,邀福于天。祿山盛陈牲牢,诸巫击鼓、歌舞,至暮而散”^{[18]83}。不少祭天的粟特人都精通这种乐舞,如安祿山“晚年益肥壮,腹垂过膝,重三百三十斤,每行以肩膀左右抬挽其身,方能移步。至玄宗前,作胡旋舞,疾如风焉”^{[1] 卷205上, 5368}。可假设杨玄璈沿袭祖风,娶有粟特裔妻妾,依祆祠而居,女眷们祭天时,携带玉环同往,玉环以聪明伶俐而精通了这种祭祀乐舞。

宗教活动是民俗的反映,“中土流行的祆教,其载体是九姓胡移民”^[19]。祆祠祭天活动就反映了中亚粟特人的生活习俗,彼地多产葡萄酒,如康国“多葡萄酒,富家或致千石,连年不败”^{[20] 卷102 2281}。“人多嗜酒,好歌舞于道路”^{[1] 卷198, 5310}。粟特人祭天要饮葡萄酒,“汉唐时期风行中国的葡萄酒,是九姓胡的传统名产。……作为九姓胡的民族饮料,葡萄酒也是酬神的供品和对外交往的贡品”^{[21]31}。玉环虽为汉人,“具有完整意义的祆教,只是在当地胡人移民中流行;汉人只是把该教的一些外表仪式活动,当为一种胡俗,加以接受、参与,很少成为该教的信徒”^{[19]252}。粟特聚落祭祀时畅饮葡萄酒,酣歌醉舞,玉环随叔母辈学会了异域绝技,这或许是玉环“笑领意甚厚”、“醉中舞《霓裳羽衣》”的生活根源。洛阳教坊、梨园中也有粟特人,玉环从之学艺虽有可能,但乐工们教闺中少女饮酒极不符合人情伦理,所以这条学习渠道可排除在外。看来贵妃醉酒并非仅为与虢国夫人等争宠之事,且与少时阅历有关。

三、结论

综上所述,可得两条假说:第一,开元十二年(724)末到十三年(725)初,在处理蜀州夺观事件时,唐玄宗亲自过问,益州长史张敬忠慑于皇帝的宗教倾向,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。蜀州司户杨玄琰因信仰之缘故,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终结,玉环沦为孤儿。第二,在杨玄璈一家的生活圈子中,玉环竟然也学会了家族中酣歌醉舞的普通本领。她与玄宗结为连理后,招有琵琶弟子,遇酒逢宴,还时常展现酣歌醉舞的才艺,后世誉为传奇。其实,玉环在洛阳学习乐舞时就已如此,那不过是祆祠祭天的普通礼仪而已。以上不为定论,略备谈资。

【参 考 文 献】

- [1] [后晋]刘昫,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2] [宋]欧阳修.宋祁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 [宋]王溥.唐会要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5.
- [4] [宋]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- [5] 陈艳玲.略论唐代巴蜀的佛道相争[J].历史教学问题(上海)2008(2).
- [6] [宋]洪迈.容斋随笔[M].孔凡礼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- [7] [清]董诰.全唐文.上海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8] 陈寅恪.元白诗笺证稿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.
- [9] 陈寅恪.武曌与佛教[M]//金明馆丛稿二编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.
- [10] 李潜.松窗杂录[M]//上海古籍出版社编.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
- [11] [清]徐松撰.李健超增订.增订唐两京城坊考(修订版)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6.
- [12] 辛德勇.隋唐两京丛考.下篇.东都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1.
- [13] 秦浩.隋唐考古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2.
- [14] [唐]张鷟.朝野僉载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15] 荣新江.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1.
- [16] [唐]郑处海撰.田廷柱点校.明皇杂录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4.
- [17] 周群.唐宋传奇经典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9.
- [18] [唐]姚汝能.安祿山事迹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19] 林悟殊.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[J].余太山主编.欧亚学刊(第二辑).北京:中华书局,2000.
- [20] [北齐]魏收.魏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1] 蔡鸿生.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
【责任编辑 伍纯初】